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3.003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丁佐琴^{1,2}, 汪小龙¹, 孙雪梅³

(1. 无锡太湖学院会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64; 2. 国立釜庆大学经济学院, 韩国 釜山 612022;
3. 东南大学经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关键词:廉洁文化;廉洁社会;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3-0015-06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DING Zuoqin^{1,2}, WANG Xiaolong¹, SUN Xuemei³

(1. School of Accounting, Wuxi Taihu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06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Busan 612022, Korea;
3.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Abstrac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uncorrupted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clearly put forwar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Clarifying the role and boundaries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on China's integrity culture and mechanism and building a new era of integrity culture system will becom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integrity culture research as a whole and to grasp its doctrinal orientation. First, a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level, we should discus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grity culture and clarify questions of why and how the integrity culture system is built. Secondly, at the level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grity culture, for instance, who the main body is, what the tasks are, and what forms and functions are in the integrity culture mechanism. Finally,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rol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o empower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of integrity culture and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academic theory to practice in research on integrity culture theory and mechanism.

Keywords: the culture of integrity; society of integr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common prosperity

一、引言

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要
通过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也是廉洁文化建设首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公开讲话中。《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十篇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中,加强社

收稿日期:2022-12-29

作者简介:丁佐琴(1982—),女,江苏盐城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E-mail:dingzq@wxu.edu.cn。

会主义廉洁文化理论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廉洁文化机制体系,最终形成廉洁社会是题中之义。同时,《纲要》第十四篇还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再分配机制,发挥公益、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而且,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从二〇三五年到 21 世纪中叶,要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实现全面提升,促进社会公平和行政效率,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保第三次分配在廉洁道德、廉洁文化和廉洁习惯等多维度力量的推动下提升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应有之义。因此,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性。

然而,现有关于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方面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政府反腐败^[1]和高校廉洁^[2]等特定主体层面,针对社会层面的廉洁文化研究尚显不足。即使少量的研究从廉政领导力^[3]、廉洁文化传播效果^[4]以及廉洁文化价值观要素^[5]等方面探讨了廉洁文化建设的子课题,但是,因为缺乏对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发展的进一步考察,甚至出现了将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混同的结果。而且,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文化制度,必须要结合当前第三次分配的社会环境,经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才能发挥廉洁文化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预期功能^[6]。因此,深入研究第三次分配环境下的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建设也具有了迫切性。

为进一步研究上述问题,本文以第三次分配为切入点,以促进社会公平、行政效率和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时期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体系。之所以将廉洁文化构建聚集于第三次分配视野下,是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党的十九大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六次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反复强调的重点社会制度,其主体的大众性、实施的文化性、组织的公共性和效果的公益性,与廉洁文化形成良好的契合,是新时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实现路径^[7]。

二、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

目前,中国的廉洁文化理论整体架构尚不完善。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我国强调国家及政府在廉洁中发挥的作用,建立的廉洁文化和廉洁机构相对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因此,学术中出现了将廉政文化拓展为廉洁文化的现象。但是,廉

洁文化并不同于廉政文化,甚至因为廉洁文化的作用主体、实施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廉洁文化是上位于廉政文化的概念^[8],更不能将廉政文化的理论和机制构建简单地移植到廉洁文化体系中来,而应从廉洁文化自身的定位出发,理解其外延和内涵、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

(一)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因何而建?

李季等^[9]提出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需要注意针对性和层次性,即首先要立足公职人员廉洁,其次是全党廉洁,最后是全社会廉洁。李红勃^[10]依据香港地区的廉洁社会改造活动经验,提出不仅要强化国家防腐,同时要开展社会防腐,在完善廉洁制度的同时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因此廉洁文化研究乃至“廉洁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如何构建当前第三次分配视野下以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效率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廉洁文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是整体上把握廉洁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1. 廉洁文化因社会公平而建

建设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是实现我国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廉洁文化是全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准则和生活方式,是全社会实现防腐、倡廉和廉洁型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当前,全社会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不公平现象,例如权力腐败、区域发展不平衡、国民收入差距加大等。何增科^[11]指出,建设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和社会才能实现促进机会均等、保障公民权利、形成法治政府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廉洁文化为社会公平而建,符合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方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载体、过程和手段,是政府执政为民、立法为公的着眼点。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第三次分配区别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其最大特点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参与人以资助、捐赠和募集等慈善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旨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第三次分配制度纳入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中来,有利于实现对传统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突破,形成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公平体制和机制。

2. 廉洁文化因社会效率而建

社会效率是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化的命题来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命题是如何提高社会效率。WANG X 等^[12]以中央苏区的廉政文化建设为例考察了文化建设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廉洁文化通过政府廉洁示范效应,带动社会廉洁认知、廉洁保障制度的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廉洁文化理论体系需要围绕社会效率,是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性相关联的。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逐利性,金钱本位的市场求利原则造成社会只讲物质追求不讲精神满足、只讲利益不讲道义、只讲索取不讲奉献,这一市场特性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观是相悖的,需要通过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加以规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市场意识的多元化、独立化和差异化,造成政治上的小团体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不利于整体社会效率的提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高社会效率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要求。中共中央第十次财经会议强调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第三次分配是立足于增量的同时,通过公平原则的制度设计激发社会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社会效率。

3. 廉洁文化因共同富裕而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优越性。李景治^[13]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满足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等制度安排,鼓励和促进第三次分配,发展捐赠和慈善事业,让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扶贫、教育、医疗和救助等公益事业中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李旭红^[14]认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可以在第三次收入分配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慈善、捐赠文化理论建设,进一步促进第三次分配活动,发挥慈善文化理论建设在第三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共同富裕。

(二) 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如何以建?

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是在思想起源、文化形成和实践锤炼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蕴含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取向,催生并引领廉洁文化理论体系迈向学术独立发展的轨道,进而积淀生成廉洁思想、廉洁文化以及廉洁实践多元的廉洁文化理论体系。

1. 以廉洁思想为体系基石

廉洁思想成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架构的关键。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思考,廉洁文化工作方向就会出现偏差。加强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以

廉洁思想为理论体系基石。廉洁思想的渊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廉政思想以及习近平的依法治国理论,李文^[15]认为国家意识的创建和培育、廉洁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廉洁思想是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发动机”,处于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石位置,始终承担着廉洁思维和理论构建的首要任务。廉洁思想就是要回答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执政党性质的比较研究,廉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运用于政治实践的必然结果,是以思想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品质与政治追求,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廉洁运行的根本属性。因此,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从文化语言转化为活生生的实践话语,提炼和总结廉洁文化服务社会公平、行政效率与共同富裕的经验方法尤为关键。勾画廉洁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不能简单地由上而下进行,而是通过第三次分配的传播,形成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认知,进而发挥社会多元化主体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潜力,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2. 以廉洁文化为体系支撑

廉洁文化研究延展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架构的广度。廉洁文化研究涉及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实现和表达,支撑着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是社会公众关于廉洁社会的思想、信仰、知识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评价的总和,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张国臣^[16]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时代发展趋势。它的建设和繁荣,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升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反腐倡廉建设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将廉洁文化建设视为国家适应新形势的战略工作。如何使廉洁文化发挥作用?通过第三次分配文化的动员,社会形成尊敬捐赠者、慈善人的氛围,从而发挥除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之外的,通过廉洁文化根除不公平分配规则的新的财富分配正义。

3. 以廉洁实践为体系成果

廉洁实践研究展现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架构的高度。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第三个维度是廉洁实践活动,包括提升廉洁文化执行能力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维度、推进廉洁文化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践维度,以及实现廉洁文化常态化能力

的净化政治生态的政治实践维度。在城市层面,广州大学课题组^[17]提出的通过提升廉洁文化建设智能水平、保障公共权利规范运行,实现技术支撑的“智慧广州”建设,以及李红勃^[10]提出的通过监察制度改革和税务局推动的廉洁文化宣传,构建廉洁文化建设的“香港廉洁社会改造”活动;在国家层面,日本和新加坡形成的使不廉洁者难以在社会中立足的“恨人及屋”的除秽文化。在城市层面和国家层面均显示出廉洁实践活动是产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建设成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廉洁实践分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三个层次,罗静^[18]更是将廉洁文化的实现路径细分为“公众渠道、行业渠道、家庭渠道和个体渠道”等,各个渠道又包含了廉洁文化的“价值实现、功能实现、道德实现、政治实现和人格实现”等多个维度。廉洁实践的落脚点是“透明度”建设,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透明度”建设,通过第三次分配制度提高的社会透明度,可以进一步提升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成果水平。

三、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机制的建设

廉洁文化是以崇尚廉洁、反对贪腐为价值取向的,反映的是社会对廉洁追求的程度,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廉洁文化机制建设是要形成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以人为本、正面引导、突出重点和全员参与的整体格局。廉洁文化机制建设的机理是要以廉洁文化宣传为前提,以廉洁行为引导为关键,以廉洁制度建立为保障,进而实现廉洁文化服务于国家治理、服务于社会规范和服务于家庭伦理的最终目标。

(一)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

廉洁文化机制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在厘清廉政文化和廉洁文化的基础上,以廉洁文化宣传为逻辑起点、以廉洁行为引导为逻辑展开、以廉洁制度确立为逻辑效果,最终形成和谐有序、层次清晰、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

1. 廉洁文化宣传是机制运行的前提

廉洁文化宣传是我国廉洁文化机制建设的迫切要求。廉洁文化宣传是廉洁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廉洁文化机制的力量源泉,是国家反对贪腐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廉洁文化的宣传,将廉洁文化渗透到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中,内化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为廉洁文化机制的良好运行奠定基础。廉洁文化宣传还要解决一些与廉洁文化机制运行不相协调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社会公

众对廉洁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存在部分误区,认为廉洁文化就是政府和公职人员的事情,普通公众无须廉洁意识的培养。但是恰恰全社会的廉洁是一种从下而上的运动,只有社会以廉洁为荣,以贪腐为耻,从社会环境上营造廉洁氛围才能真正形成廉洁型社会。另一方面是廉洁文化宣传停留于形式,忽视了廉洁文化宣传的精神实质和准确定位。杜治洲等^[4]提出廉洁文化宣传应借助新媒体平台,提升廉洁文化宣传的范围、效果和方向的研究,相比现有的演节目、唱歌曲和搞画展的形式,可以通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廉洁形象等方式进行廉洁文化宣传。此外,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自发的爱心力量自愿回报社会,进行自愿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将有助于廉洁文化的宣传实施。

2. 廉洁行为引导是机制运行的关键

廉洁行为引导是推动廉洁文化机制运行的重要内容、途径,也是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即如前所述,廉洁文化的宣传要利用有效的媒介、媒体手段进行传播,使廉洁文化成为社会公众普遍的道德实践,产生廉洁行为。LEE T C^[19]和 NAM T^[20]分别考察了廉洁文化与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成效以及中国电子政务系统的适用对反腐败的调节作用,结果均肯定了廉洁行为的引导对廉洁文化实施效果的保障作用。笔者认为,廉洁行为引导需要进一步明确行为的方向、目标、内容、形式、载体、手段,以及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内容。首先,廉洁行为引导的方向要以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宏观规划为指导,目标要服务于廉洁型社会的建设。其次,廉洁行为引导的内容应为社会廉洁文化、公权力廉洁文化和公职廉洁文化三个部分,形式要与国家的发展进步同步且具有变革创新性。再次,廉洁行为引导的载体可以借助广播、电视、报纸和学校等传统载体,也可以发挥新媒体、物联网等手段方面充分发掘人文历史、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有益补充。最后,廉洁行为引导机制和模式方面,在注重内生机制和模式建设的同时,也要形成廉洁文化建设的发展机制和评价机制等。第三次分配制度和廉洁文化机制一起,基于制度化的回报递增、承诺递增和共同信念等生产机制,有助于实现廉洁行为的规训功能。

3. 廉洁制度确立是机制运行的保障

廉洁文化机制运行的重要特征是保持权力关系顺畅运行于制度轨道中,因此廉洁制度的确立是廉洁文化机制运行的重要保障。香港的廉洁制度确立着重体现为税务局和廉政公署的工作内容,其

中税务局下设两个廉洁文化机制科室,分别为社区关系科(一)和社区关系科(二),其中,科(一)负责制定廉洁文化商业推广策略、与大众媒体、新媒体、反贪机关和国际机构保持联系;科(二)则直接负责与市民进行面对面的廉洁文化教育工作,与社会各阶层保持最直接的宣传互动。在国家层面,美国是通过制定有效的行政伦理机制,确立廉洁文化制度的。美国于182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伦理法典》,1978年制定了《美国政府伦理法》,1990年又颁布了内容更为详尽、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工作人员伦理行为准则》。田旭明^[21]认为中国的廉洁制度建设,无论从学理角度还是现实腐败发生和治理的角度,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制度将制度反腐和廉洁文化建设完美结合,形成“善治”和“善德”齐头并进的协同态势。法律层面的制度确立,包含廉洁文化的规章制度、行政法规和法律等。第三次分配和廉洁文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对其做出制度方面的确立刻不容缓,中国应充分利用《慈善法》修订的契机,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制度机制。

(二)廉洁文化机制的功能表现

廉洁文化作为一定社会时期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理念形态,对国家治理、社会规范和家庭伦理等方面产生文化辐射和教育功能。同时,廉洁文化机制致力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洁社会,探究廉洁文化机制理论脉络、时代境况、演进方向和价值追求,在整体功能表现上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 国家治理方面的功能表现

吴国斌^[22]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总结中国廉洁文化建设历史,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权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建设廉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和政治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规律,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推进廉洁文化机制建设。廉洁文化作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功能表现为:首先是推进依法治国,没有廉洁的政府和社会,就没有法治化的国家。廉洁文化是良法善治的前提,中共中央十八次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廉洁治党、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廉洁文化机制可以为立法和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是宏观调控市场,廉洁文化与第三次分配一起,推进分配结构的调整,补充政府职能可能存

在的监管和调控缺位、错位的问题,保障公共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公平。最后是规划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以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共同富裕中的重要地位。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可以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框架内,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第三次分配与国家治理功能的实现是紧密相关的,在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次分配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把第三次分配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中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表现

廉洁文化机制影响着社会个体的行为,维护着社会基本秩序,将社会廉洁行为纳入体制轨道中,产生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作用。RIMAL R N等^[23]指出,廉洁行为对于描述性社会规范与指令性社会规范的影响通常是一致的,例如社会化公众可能认为其他大部分人都保持廉洁行为(描述性规范),如果自己不廉洁,可能会被排斥而失去朋友(指令性规范),于是选择了廉洁行为。建设廉洁文化机制就是要解决社会规范当中自律性“低下”的问题。廉洁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和人的自觉性是建立不起来的,它必须要有结构性的基础,核心是建立廉洁文化机制。实行廉洁文化机制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的他律机制,具有法律强制力和社会约束力;另一个是要建立健全廉洁文化的组织协调机制和相关制度,形成廉洁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这样通过法律、社会权力和相关制度规定的持久作用,形成有组织的法律体系、制度规范和社会公共舆论,保证社会规范方面的功能实现。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参与主体是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实施,也必将推动社会规范的形成。

3. 家庭伦理方面的功能表现

廉洁文化机制最具实践性的单元是家庭伦理功能表现。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家庭伦理是社会氛围的基本细胞,只有廉洁文化促进了家庭廉洁伦理的形成,才能最终形成廉洁型社会。周至涯等^[24]认为廉洁文化对于家庭伦理方面的功能要实现廉洁教育对“现实的个人”的重视,避免出现理想化、认知化、抽象化等倾向,保证廉洁教育的感染

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全面加速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推进。破解作用于家庭伦理功能表现的现实困境的对策在于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导向,通过重塑廉洁教育的理念,重构廉洁教育的内容,筑牢廉洁教育的运行基石,实现廉洁文化与家庭伦理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廉洁文化机制在家庭伦理方面的功能表现为道德廉洁、勤俭廉洁和文化廉洁,首先道德廉洁是要实现家庭中父母以身作则、以德治家、对孩子身兼表率,用自身的公正廉洁培育家庭伦理。其次勤俭廉洁是指家庭要勤以养廉、俭以助廉,摒弃奢侈浪费陋习,提倡厉行节约的家庭伦理。最后文化廉洁是家庭廉洁的长效机制,家庭从文化上提炼廉洁要义,树立正确的廉洁观、价值观和人生观。2021年6月15日,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在清华大学“第三次分配研讨会”强调家庭伦理的构建需要以第三次分配实现社会资源的均平化调整为驱动力,实现家庭廉洁和社会廉洁。

四、研究结论

构建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与廉洁文化制度在共同富裕中的功能。因此本文研究得出主要结论:

第一,第三次分配制度安排是廉洁文化理论体系和机制运行的有益补充,两者的文化宣传功能、行为规训功能和实践表现功能,共同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效率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二,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当围绕社会公平、社会效率和共同富裕展开,整体架构以廉洁思想为体系基石、以廉洁文化为体系支撑、以廉洁实践为体系成果保障。

第三,廉洁文化机制运行机理以廉洁文化宣传为逻辑起点、以廉洁行为引导为逻辑展开、以廉洁制度确立为逻辑效果,最终形成和谐有序、层次清晰、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廉洁文化机制运行体系。

第四,廉洁文化的机制功能表现与国家治理功能、社会规范功能和家庭伦理功能是一致的,廉洁文化机制运行可以实现依法治国、完善市场调控、协调发展战略、规范社会运行以及重塑廉洁文化对“现实的个人”的教育功能等。

参考文献:

- [1] 李靖,陈希.“三不腐”机制中的社会关系嵌入研究[J].理论探讨,2020(6):176-182.
- [2] JIANG C, YU H, FANG J. The construction of full coverage of clean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s realization[C]//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CADCE 2018). Paris: Atlantis Press, 2018: 820-825.
- [3] 杨守涛.廉政领导力研究的理论启示与未来展望[J].领导科学,2020(2):20-23.
- [4] 杜治洲,万超凡.基于公众感知的廉洁文化传播效果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1):68-77.
- [5] 问青松.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清正廉洁价值观之要素及源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4):25-27.
- [6] 王杨,邓国胜.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化:实现机制与建构路径——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4):16-24.
- [7] 韩文龙,祝顺莲.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与实现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5):31-37.
- [8] 沈其新.中华廉洁文化基本理论三题[J].湖南社会科学,2007(5):145-148.
- [9] 李季,龚界文.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构建问题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S1):79-80+89.
- [10] 李红勃.香港廉政公署的廉洁社会改造运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1):181-192+209.
- [11] 何增科.廉洁政府与社会公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15-23.
- [12] WANG X, XU Z. The Measures,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J].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4): 197.
- [13] 李景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J].党政研究,2021(1):5-13.
- [14] 李旭红.三次分配视角下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政策选择[J].税务研究,2021(11):14-17.
- [15] 李文.东亚国家廉政文化建设比较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6(3):50-56.
- [16] 张国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现实功能论略[J].河南社会科学,2012,20(1):56-59.
- [17] 广州大学课题组.构建保障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的安全平台——广州“廉洁城市”建设的实践观照[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22-125.
- [18] 罗静.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要义与实现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6(11):110-114.